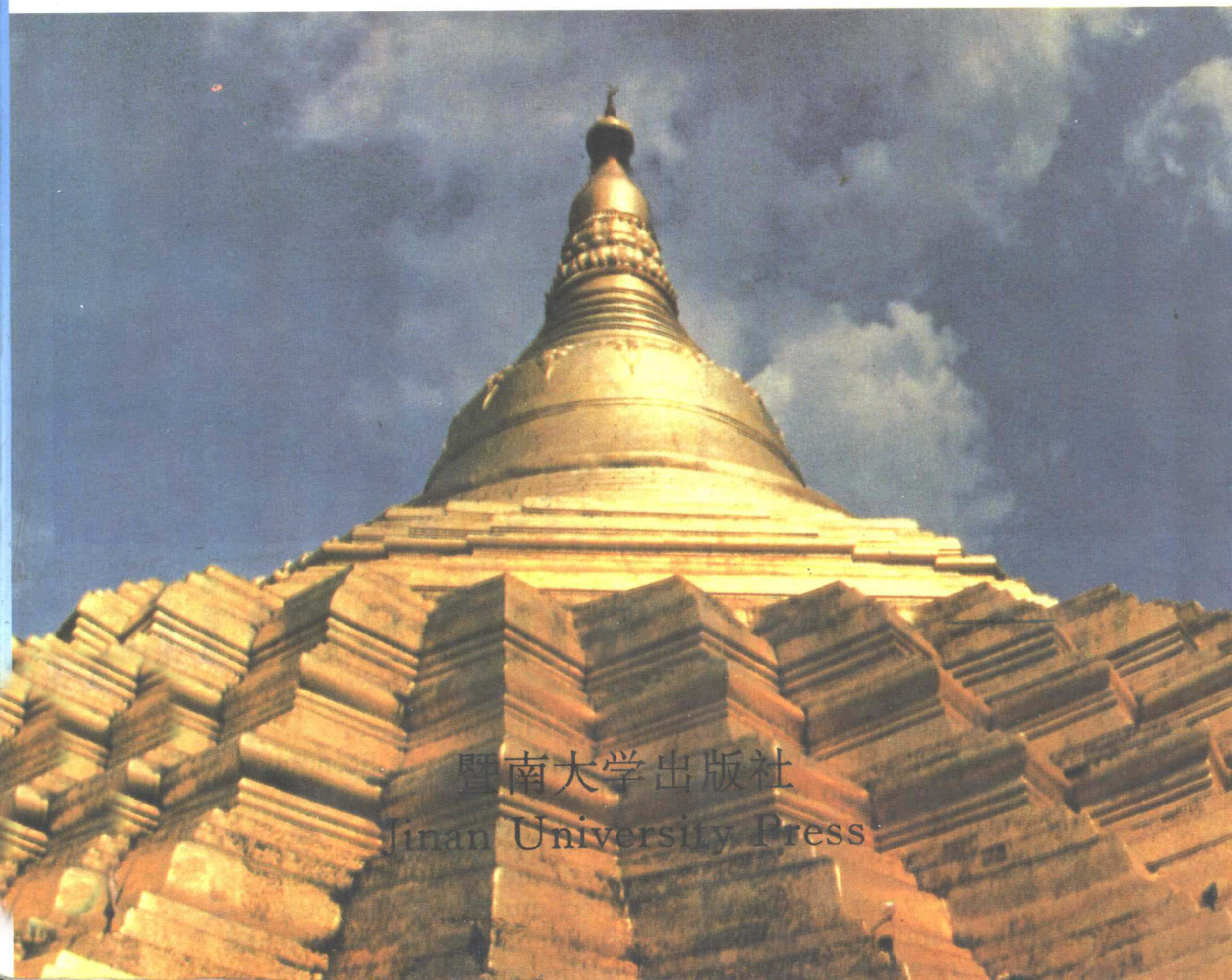


陈乔之 黄滋生 陈森海 主编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现状与展望

China's Southeast Asian Research: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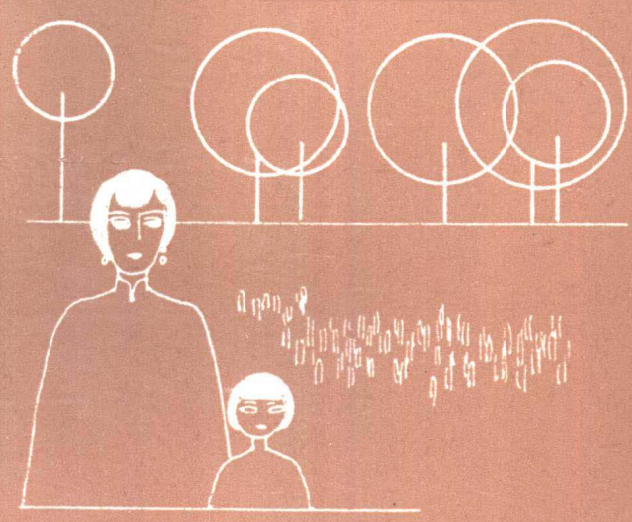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120
C07
265
S
120
F722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现状与展望

陈乔之 黄滋生 陈森海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2 • 广州

粤新登字第 13 号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与展望

陈乔之 黄滋生 陈森海 主编

*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 石牌)

广东省委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25 字数:49万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1029-145-9/C·7

定价:12.00元

序

过去十年，中国遵循“对外开放”政策，已扩大并加强了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联系。中国成为一些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的新成员，并在地原已加入的机构和组织中重新发挥积极作用。她不仅已在国际经济领域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里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着意提高中国在这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国际角色的能力。他们大力鼓励提高学术专业水平，提倡共同决策，改善数据调查和分析手段，同时加强了对研究机构的领导，加强在国际关系研究和地缘区域研究方面的人才培训。

对东南亚各邻近国家事态发展的了解和研究也已引起更多重视。由于近年来中国东盟诸国复交，同时由于这些国家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为寻求印支冲突和解的共同目标，中国更加意识到她自秦汉以来同这一地区建立联系的重要意义。柬埔寨问题的行将解决，中越关系的逐步正常化，加上东盟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关键作用，都进一步说明中国对这一地区深入了解的必要性。

正是鉴于上述背景，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借所庆30周年之机会，举办了名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现状与展望”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于1990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广州举行，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各东南亚研究机构的领导和研究人员，还有来自法国、荷兰、日本、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老挝、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约30名专家学者。

会议的发言回顾了中国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南亚研究在质和量方面取得的令人鼓舞的进展，同时毫不隐讳地摆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诸如：同国外学者交流不足；缺乏训练有素的研究人才；客观性研究受到一定限制；缺乏研究经费、图书资料和设备；学术部门与决策部门之间缺少沟通，等等。中国南方五间主要的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广西和云南社科院的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在闭幕会上宣布了一项特别令人鼓舞的决定：计划共同出版《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互换图书和期刊，并且联合举办图书资料和研究人員培训班。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举办此次国际研讨会并以中英文出版会议论文集，使研究成果得以广为流传，此举深得所有东南亚研究同仁的赞美和感激。这次会议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有助于了解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还在于它为考察90年代在本领域的研究动向提供了一把衡量的标尺。

福特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 彼得·盖思南

1991年9月

（曾庆丰 译）

11/26/08

目 录

序	彼得·盖思南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朱振明 (1)
中国十年来对东南亚的研究	戴可来 王介南 (8)
对我国东南亚研究的认识	陈乔之 (16)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之我见	温广益 (21)
有关东南亚问题研究的几点体会	汪慕恒 (25)
开展综合研究, 把我国东南亚研究提高一步	马 宁 (30)
我国南方东南亚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潘一宁 (36)
中国南方的东南亚研究现状与展望	邓水正 (40)
端正学风, 优化环境, 振兴东南亚研究	张锡镇 (44)
改进研究方法 提高学术水平	郑仁良 (49)
中国东南亚研究中的国际学术交流问题	汪新生 (51)
东南亚语言与东南亚研究	林明华 (54)
从载文分析看中国近年东南亚研究的共识度与理论层面开放	刘永焯 (59)
东南亚研究中的资料建设问题	陈希育 (67)
评介十年来云南东南亚研究所对东南亚的研究	王士录 (70)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有关东南亚经济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	汪慕恒 (79)
关于印尼华人问题研究的定名问题	杨启光 (83)
越南研究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古小松 (89)
东南亚研究资料的交流——关于在中国建立东南亚信息网的建议	林黄佩萱 (93)
对菲律宾东南亚研究的若干评论	特雷莎·张·卡里诺 (103)
从日本的东南亚研究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许清章 (104)
80年代日本华侨、华人问题研究述评	郭 梁 (112)
苏联对东盟的研究	郑天林 (119)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之我见	托比·艾丽斯·沃尔克曼 (123)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	特里尔·E·劳茨 (128)
法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简介	让·贝尔利 (131)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简介	(133)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简介	(134)
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简介	(137)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简介	(140)
云南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简介	(143)
后记	(146)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 朱振明

一、我国东南亚研究取得的可喜成绩

1. 研究成果令人欣慰

科研成果是反映科研成绩的主要标志。80年代,我国东南亚研究的成果累累。这些成果有几个特点。

第一,一批有较高水平的专著、译著出版问世。这些专著、译著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华侨、文化等学科或领域。按照出版时间先后顺序,择其要者,计有如下专著: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东南亚五国经济》(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碧笙等著《陈嘉庚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韩振华主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蒙文通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谷源洋等编著《东南亚各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4年)、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温广益等著《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郭明等编著《越南经济》(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国安等著《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邹启宇编《南洋问珠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吴志生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黄滋生、何思兵著《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李学民、黄昆章著《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泰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徐建国、吴洪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年)、刘迪辉等著《东南亚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金应熙主编《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菲律宾史》、陈碧笙主编《华侨华人问题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著《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申旭、刘稚著《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孙福生著《印度尼西亚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吕范著《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陈显泗著《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等等。

主要译著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姚楠译《东印度航海记》(中华书局1982年)、姚楠等译《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郭梁、刘晓民译《东南亚华侨经济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马宁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楠、马宁译《东南亚历史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王云翔等译《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厦门大学出

版社1989年)、季国兴等译《东盟国家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张乃坚等译《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等。

第二,古籍整理和资料汇编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东南亚研究中的一朵奇葩。这类成果主要有:江应梁著《百夷传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苏继庠著《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夏鼐著《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陆俊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年)、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等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景振国主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陈显泗等编《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史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陆俊岭、周绍泉编注《中国古籍中有关柬埔寨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6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等。这类成果为中外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是东南亚研究的“基本建设”,因而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

第三,一批有关东南亚问题的工具书相继问世。这类成果主要有:许心礼主编《新加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徐成龙等编著《马来西亚》(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沈红芳编著《菲律宾》(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谭实等编著《柬埔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邹启宇等编著《泰国》(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杜敦信、赵和曼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秦钦峙、赵维扬主编《中南半岛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以及章巽、姚楠主编《西域南海地名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等等。

第四,一大批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见诸各类报刊。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研究领域之广都是建国以来所没有过的。据研究人员提供的数字,仅1979年至1986年的8年间,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研究东南亚问题的论文就有1028篇,如果加上一些资料性文章和翻译、编译文章,总数就达4024篇(参见刘永焯:“从载文看我国近年的东南亚研究”,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1988年第1期)。在这8年中,平均每两天半我国报刊上就有一篇关于东南亚研究的论文发表。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东南亚研究取得的可喜成绩。

2. 研究队伍发展壮大

目前,我国的东南亚专业研究机构主要分属于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院两个系统。属于高等院校的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广东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东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郑州大学历史系印支研究室、北京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室等。属于社会科学院的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和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亚太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许多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中都有专人研究东南亚问题。

1978年成立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已成为团结全国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教学、翻译人员的重要学术团体,目前已有会员600多人。

1979年起,我国开始招收东南亚专业的研究生,11年来已培养出50多名硕士研究生,他们已成为我国东南亚研究中的骨干,有的已成为学术带头人。东南亚专业硕士学位的授

予点已从1981年的几个扩大到现在的十几个。一批优秀青年研究人员还被派往国外深造。学成回国的一些优秀人才已挑起了科研重担。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以中年为骨干的东南亚研究队伍。

东南亚专业学术刊物已成为培养东南亚研究人才的重要阵地。目前获准在国内公开发行的专业学术刊物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南洋问题研究》(季刊)和《南洋资料译丛》(季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季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季刊)、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纵横》(季刊)。此外,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将正式成为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这些学术刊物登载了许多水平较高的学术论文和有价值的资料,有不少文章被国外的学术刊物、报纸转载和翻译发表。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研究人员通过这些学术刊物得到锻炼,提高了研究能力和水平。

东南亚研究队伍发展壮大的另一个特点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政府机构中的一些政策研究部门、大企业的调研部门也开始或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研究。这样,我国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中又增加了一支生力军。

3. 学术交流日趋活跃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成立后,已经召开了四次年会。年会本身就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最近几年,各学术机构围绕一个主题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增多。以带有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为例,1988年8月在北京举行了以当代东南亚政治经济问题为主题的研讨会。1989年4月在福建厦门举行了“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12月在广州举行了“2000年前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展望研讨会”。此外,还在南宁、昆明举行过一些有关当代东南亚问题的小型学术讨论会。这些研讨会的举行,实际上是对东南亚研究成果的检阅,它加强了学术机构和学者间的联系,交流了信息,推动了东南亚研究。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最近五年来我国东南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取得了可喜成绩。

第一,已有不少研究人员出国留学、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参观访问。同时,也接待了许多国家来访的学者。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为例,该所自1984年以来,已有25人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讲学、留学,并与泰国、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建立了资料交换关系,与泰国开展了合作研究。到目前为止,该所已接待了外国来访者100多人次,其中有政府官员、驻华使馆外交官、新闻记者和学者。

第二,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5月由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承办的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南亚学术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单是与会的外国学者就达180多人,分别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泰王国王姐瓦塔娜·甘拉雅妮公主和泰国驻华大使亲临会议。这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受到外国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好评。

上述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不但促进了外国同行对我国东南亚研究状况的了解,增进了中外学者间的友谊,而且扩大了我国东南亚学术界的影响,有利于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走向世界。

二、成绩面前的反思

我国东南亚研究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景象，反映了改革、开放为社会科学带来的生机，也反映了我国东南亚学界同仁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但是，应该看到，就国内外急速发展的形势对我们的要求来说，就东南亚研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来说，就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走向世界来说，都还有一定差距。我们不能不正视东南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比较突出。

1. 研究与需要脱节

当代社会科学之所以有极大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的需要。由于社会科学越来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规划以至生产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日益成为人们最注意和最寄希望的科学。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东南亚研究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占有一定地位。8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亚研究之所以出现兴旺局面，是与社会的需要分不开的。但是，就目前东南亚研究状况与社会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存在着需要与研究脱节，研究成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矛盾。

例如，就东南亚历史研究来说，就显得有些支离破碎，缺乏对东南亚整体历史变迁的系统性研究，也缺乏对东南亚各国历史系统、全面的研究。从成果形式看，至今还没有一套多卷本的东南亚国别史和东南亚全史问世。这对于有修史传统的泱泱大国来说，是极不相称的。又从断代史来说，对古代东南亚史的研究固然是我国的优势，然而对人们更关心的战后史的研究，却显得苍白。此外，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东南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还未提到研究日程上。对历史上一些问题的定论，也还值得重新探讨。又就东南亚现状研究来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资料缺乏，难以实现实地考察等），仍然显得不够。例如，研究东南亚现实政治、经济的文章，往往宏观议论的多，微观分析的少，一般性分析的多，有说服力分析的少，回顾历史背景的多，前景预测的少；表现出对当代东南亚政治、经济基本情况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外，对当代东南亚发生的重大问题的研究也显得薄弱，有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触及。

2. 普及东南亚知识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要求我们大力普及东南亚知识。这不但是现实的需要而且也是为将来有更多后备军加入东南亚研究队伍打下基础。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受到东南亚学界的重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份介绍东南亚情况的面向广大群众的、普及性、知识性刊物。不少研究人员有一种轻视写普及性文章的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

3. 研究队伍青黄不接

人才老化，青黄不接，是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东南亚研究队伍也不例外。

作为建国以来我国东南亚研究开创者的一批老专家不少已相继过世，健在者已不多。50年代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东南亚问题的学者，绝大多数已经或将在今后五年内陆续退休。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我们虽已培养了一批东南亚

专业的研究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已离开了研究单位,从事其他工作。目前在许多研究机构挑大梁的不少是1982年前后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但他们中的一批人已步入中年。而最近几年进入研究机构的毕业研究生、大学生人数有限。他们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东西,外语能力较强。但他们的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和实际研究能力都亟待提高。这些问题若现在还不引起注意,并加以解决,东南亚研究队伍的老化或半老化、青黄不接的状况将日趋严重,势必给我国东南亚研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4. 影响研究工作发展的其它因素还未得到妥善解决

这类问题较多,带有普遍性的有:一是研究机构的经费普遍紧张,以致无法订购更多的外国资料,一些研究活动无法顺利进行。二是学术成果出版难、销售难。这无形中打击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抑制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三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落后。当代社会科学已出现了综合化、数学化、模型化、精密化、国际化的趋势。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也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目前这些研究方法还未运用或很少运用到我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在研究手段上,仍沿用传统的小生产方式,几乎还没有利用微机检索、收集、整理、分析资料的一套手段。四是自我封闭意识还未彻底改变。各研究机构之间,东南亚各学科、专业之间,都还缺乏联系,信息不灵,缺乏沟通。在研究上缺乏合作精神,不愿协同研究。这种封闭意识造成研究人员的思路狭窄、知识面狭窄,研究课题重复、陈旧(这个问题在近几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五是研究机构与实际工作部门之间还未形成有机的结合。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东南亚研究机构自身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有些则要靠政府和社会力量帮助解决。

三、推进我国东南亚研究的设想和建议

为了推进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笔者不揣冒昧,提出如下一些设想和建议。

1. 发挥优势, 拓宽研究领域

东南亚历史研究是我国东南亚研究的优势。在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中,东南亚历史研究一贯占有重要地位。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东南亚专著和译著,历史类的数量最多。在各类报刊发表的论文中,历史类的数量也名列第一。这充分显示了我国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实力,作为我国优势学科的东南亚历史研究,不但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目前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尽快写出成套的东南亚国别史及东南亚全史。除已出版的中国史籍中有关菲律宾、老挝、柬埔寨资料外,还应尽快整理出版中国史籍中有关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资料。在断代史研究中,应加强对战后东南亚史的研究。对过去较少触及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史、东南亚民族史、东南亚政治史、东南亚国际关系史都应该加强研究。

除了继续搞好东南亚历史研究外,还应该努力拓宽研究领域,加强对当代东南亚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此外,还应加强对其它领域如东南亚的文化、宗教、民族、军事等的研究。

2. 从需要出发, 加强对重点课题的研究

目前应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对东南亚国家基本情况的研究,即基本国情

研究。应该说,了解国情,认识国情是东南亚研究的着眼点。没有这一步,很难对东南亚出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第二是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趋势和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研究这类问题有助于我们借鉴东南亚各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吸取它们的教训,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第三是对90年代东南亚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对外关系发展前景的研究。研究这类超前性问题,有助于正确把握东南亚地区的形势,提高应变能力,以利“四化”建设。第四是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研究比较薄弱。现在有必要认真地从学术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加强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认真总结建国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共同维护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功夫

抓紧培养人才,是发展东南亚研究的重要一环。对这个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抓队伍发展,一方面花大力提高研究人员素质。为了抓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可以考虑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例如,搞好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工作,在有条件的地方应扩大招收在职研究生。在大学中开设东南亚历史与现状选修课,培养后备力量。以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科学系统的东南亚研究队伍为骨干,加强同其他行业、部门中的东南亚研究人员的联系,壮大研究队伍。加强在职研究人员的知识更新工作,选派科研人员出国进修或在国内进修。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多出成果,出优秀成果。为了鼓励、加速青年研究人员成长,建议设立东南亚学界青年科研成果奖。

4. 建立必要的协调机构

最近几年,我国东南亚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有所加强。一个重要特点是,由某个研究机构主办、邀请全国主要东南亚研究机构人员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增多。这种研讨会,实际上具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的性质。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活跃,我国东南亚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还会进一步加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协调机构,以便互通信息,协调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还应避免出现两个或几个单位举行同一主题、同一内容的学术研讨会,以节约开支,避免研究课题重复。

根据我国的主要东南亚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都集中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个南方省区的特点,笔者认为,这个协调机构可设在广东,也可设在云南。前者面对港澳,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重要门户,与东南亚国家联系密切,又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也最有成效的地方;后者直接与东南亚三国接壤,在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具有别的地方无法代替的重要地位。

5. 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目前,国内学术交流仍然是主战场,而举办学术研讨会又是国内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除了召开学术研讨会外,还可以考虑开展其它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如有条件,研究机构之间可以互派研究人员,带课题到对方研究机构中进行一段时间的研究。这有利于打破封闭式研究体制,有利于研究人员吸收新鲜空气。另外,可以搞跨单位的合作研究,以弥补因经费不足、资料不全带来的困难,缩短研究周期。对于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题

和内容都可以更广一些。除了讨论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外,还可以举办诸如如何发展东南亚研究、如何治学、如何办好东南亚学术刊物等的研讨会。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走出去(出国留学、进修、参加国际会议),请进来(讲学)外,还可以多举办中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书展,展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成果;向国外报刊推荐优秀论文;与外国学术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等等。总之,我们应该采取多种形式,让中国学者认识世界,让外国学者了解中国,使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走向世界。

6. 呼吁有关部门帮助解决问题

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有些问题,例如经费短缺,出书难,单靠东南亚研究机构是难以解决的。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加以解决。例如,适当增加东南亚研究机构的研究经费;增加公派出国人员中赴东南亚国家进修的名额等。总之,有关部门应为东南亚研究创造更优异的环境,提供更便利的条件,把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推向前进。

中国十年来对东南亚的研究

郑 州 大 学 历 史 系 戴可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王介南

我国较为科学地进行系统深入的东南亚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早在50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院校,已着手培养了新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人才。至60年代中期,全国已组建了四个东南亚研究机构,研究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十年动乱使有计划、有秩序的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学术机构陷入瘫痪状态,研究人员星散,图书资料流失。直至“四人帮”垮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70年代末,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才逐步恢复元气,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

十年来,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比“文革”前增加了几倍。此外,政府外事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有关高等院校尚有不少单位拥有东南亚研究的力量。

旨在团结全国东南亚研究者、协调全国东南亚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于1978年成立后,有关省区的地方性东南亚研究学术团体,如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等也于80年代初期先后成立。与此同时,与东南亚研究密切相关的民间学术团体,如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等也相继成立。

十年中涌现如此众多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在我国东南亚研究史上是罕见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东南亚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倍增,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队伍也迅速壮大。60年代初期,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只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人员充其量不超过百名。而目前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员已跃增至500余名。

就学术队伍的年龄结构来看,不但有六七十岁的老一辈东南亚研究专家,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研究人员,更有年富力强的青年研究人员。

80年代以来,朱杰勤教授、韩振华教授首次招收和培养东南亚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均相继招收和培养多批东南亚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一批批思想活跃、进取心强、专业知识结构较为完善、外语功底较为扎实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一批批出

国进修东南亚研究专业的中年学者，为我国东南亚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活力。

上述东南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大都创办了发表科研成果的刊物。主要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南洋问题研究》；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学刊》；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研究》；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的《东南亚》；广西印支研究所的《印度支那》（1990年起改刊为《东南亚纵横》）；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的《南亚东南亚评论》；北京大学东语系的《东方研究》、《东方世界》；北京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的《亚非》等。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会主办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自1980年创刊，至1988年已出刊33期。最近，经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会讯》已获刊号。它正成为发表会员研究成果的园地和交流信息、沟通会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这些刊物的创办、发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东南亚研究欣欣向荣的局面。

十年来，我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一扫昔时“人自为战”封闭式研究的旧习，有效地开展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了沟通学术信息，交流科研经验，探讨共性问题，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三届理事会做了大量工作。除坚持办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外，还先后在厦门、昆明、广州、南宁和北戴河组织了五次学术讨论会，达到了汇报学术成果、交流学术信息的目的。还组织过诸如《缅甸史》、《菲律宾史》编写问题的多次小型专题学术讨论会。至于各有关省区的东南亚研究会、华侨历史学会的学术讨论会也举办过多次。这些全国性、地区性和专题性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对扩大研究人员的视野，拓宽思路，调动积极性，搞好协作，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十年来，中国东南亚学界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同行专家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国内方面通过学术会议、互邀讲学等各种方式，使东南亚学界之间的交流日趋经常化。我国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朱杰勤、侯方岳、陈炎、陈玉龙、何肇发等，都曾走出书斋，应邀到各地讲学，受到热烈欢迎。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东南亚学界已与英、美、法、德、日、荷、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许多国家的东南亚研究机构，有了人员交流和学术联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出访和外国学者来访十分频繁。我国的学术机构还与外国同行进行合作研究，取长补短，促进彼此的研究课题更加深入。频繁的学术交流，对开阔我国东南亚研究工作者的视野，了解世界东南亚研究的信息和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

十年来，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译文，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30年。我们援引（并感谢）刘永焯同志经过较为精确的统计之后得出的一些数字。如果以1979年载文数量为基数100，那末，1980年载文指数是143，1981年大幅度上升到297，1982年是298；1983年继续上升，达到318；1984年为310，1985年达330；1986—1988年，载文指数继续上升。

学术论文是衡量研究水平、检验研究质量的标准之一。如果以1979年发表的论文篇数为100，1980年论文指数为174，1981年达370，1982年是393，1983年是390，1984年是445，1985年达516，是基数的五倍多。

再从翻译文章占各种载文数量的比例来看,1979年为45.9%,1980年降为29.5%,1981年又降为27.7%,1982年复升为36.1%,1983年又上升到38.3%,1984年复降为34.8%,1985年又降至30.9%,1986年降至28.8%。译文数量下降的事实,意味着论文数量的增多。这也正好说明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正在逐渐扭转起步阶段以翻译文章、编写基本资料为主的局面。

从十年来发表文章的类别来看,“政治”类数量较多,约占文章总数的30%。这与十年来东南亚局势微妙纷繁,越南侵略柬埔寨热点的出现,菲律宾和缅甸局势起伏动荡,苏美在东南亚地区的争夺形势的出现不无关系。东南亚的形势变化,与我国的安危息息相关。这就必然使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东南亚的政治形势上。从政治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主要研究了以下这些方面的问题:柬埔寨问题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趋势;越南的国内外政策与越、老、柬的所谓“特殊联盟”关系;苏越关系;中越关系;东盟六国对柬问题的态度及其对策;印支难民问题;东南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印尼军人政权;菲律宾政局;泰国政局;奈温军人政权及其“缅甸式社会主义”;东盟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民主化;中国—印尼关系改善的趋势;新独立国文莱。

“经济”类文章数量次于“政治”类文章,约占发表文章总数的29.5%,但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果以1979年“经济”类载文量为基数100,那末,1980年载文数即为180,1981年上升到380,1982年跃至519,1983年降为417,1984年又跃至585,1985年再度跃至704。1986年至1988年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值得一提的是,1984、1985年“经济”类文章数量已跃居其他各类文章之首,分别占总文章量的34%、36%。这表明,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国内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外部世界的经贸往来日渐增多。由于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这一点上有共同点,所以,科学地研究东南亚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为我国“四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自然成为东南亚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应该说,近年来对东南亚经济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做得尤为突出。“经济”类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各个方面:东南亚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南亚国家与美、日、欧洲共同体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贸关系;80年代东盟各国的经济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其前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被誉为“亚洲第五小龙”的泰国的经济崛起的原因;东盟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东盟各国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得失;越南经济与印支经济形势;“缅甸社会主义经济”的破产;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形成及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东南亚各国与我国的经贸关系。

“文化”类文章占总数的比例不大,大约占11.5%。笔者认为:国内的“文化热”方兴未艾,这股“文化热”必然会导向中国东南亚研究界对东南亚文化研究的增强。

“军事”类文章数量最少,仅占总文章数的1%。这是目前我国东南亚研究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由于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偏重于历史研究,所以“历史”类文章数量最多,约占论文总数的38%,居于各类文章之首。涉及的内容有:东南亚国别史;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史和交通史;东南亚民族源考证;东南亚各国华侨史;古代东南亚社会、经济、文化史研究;中法战争史;中国元、清两朝征缅史;英缅战争史;东南亚历史人物评介等。

我国古代对东南亚的记述极为丰富,但都散见于各种载籍之中,亟待系统地归纳、整

理和考证。而对东南亚现状的研究,一方面由于我国起步较晚,一方面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研究空缺,许多基本史料、资料方面的空白也亟待填补,所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少学术机构不得不组织力量率先进行古籍整理和现状资料的搜集汇编工作。十年来汇编出版的主要资料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汇编》,郭明等编《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昆明军区政治部联络部合编《现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黄重言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南洋研究所编《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史料》等等。正在付梓之中的,有余定邦等编《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戴可来、杨保筠编《越南史料三种》等等。

学术专著和专题论文集最能体现作者的研究水平。十年来,在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出版的有关东南亚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不下百部,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中有: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各研究单位编印的有关东南亚史或华侨问题的专题论文集,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主编《东方研究》(1—5辑),姚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姚楠著《星云椰雨集》,朱杰勤著《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温广益等著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朱杰勤主编、黄滋生等著《菲律宾华侨史》和李学民等著《印尼华侨史》,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金应熙主编《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史》和《菲律宾史》,陈碧笙、杨国桢著《陈嘉庚传》以及温广益主编《华侨名人传(广东)》,汪慕恒主编《东南亚华人经济》,吴志生主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徐建国等编《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吴凤斌著《契约华工史》,黄铮著《胡志明与中国》,黄国安等编《中越关系史简编》,郭明等著《越南经济》,刘迪辉、李惠良主编《东南亚简史》等等。

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组稿出版的“小丛书”中,也有一些是涉及东南亚研究的。如陈显泗的《吴哥文化》、韩学文的《缅甸救国英雄昂山》、郭振铎的《扶南王国》、彭家礼的《英属马来亚的开发》和王介南的《缅甸贡榜王朝》等。

为了赶上东南亚研究的世界水平,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信息空缺,为东南亚研究界提供必要的国外参考资料,近十年来我国东南亚研究者努力译介了多部世界东南亚研究名著。如: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英国霍尔著《东南亚史》(上、下册),姚楠、陈炎等译美国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姚楠、马宁译卡迪著《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下册),姚楠编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荷兰邦特库著《东印度航海记》,姚楠、陈立贵译澳籍华人杨进发著《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1901—1921)》,戴可来译越南阮雅等著《黄沙和长沙特考》和潘辉黎著《越南民族历史上的几次战略决战》,赵维扬、李孝骥等译缅甸貌貌博士著《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贺圣达译缅甸貌丁昂著《缅甸史》,马宁、段立生译《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泰国当代文化名人披耶阿努曼拉查东的生平及其著作》,李学民、陈巽华译印尼林天佑遗著《三宝瓏历史》和新加坡苏里亚迪纳达博士著《爪哇土生华人政治》,李学民译印尼萨奇门著《蒂博尼哥罗战争史》,刘永焯译法国默涅著《柬埔寨史》,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译丛》(1—4辑),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定期编辑出版的《南洋资料译丛》等。

著名的中国东南亚史学家姚楠在翻译世界东南亚研究名著和华侨史著作方面尤著劳